

三、異床同夢的四個兄弟

臺灣話文的新

克夫先生「答李春霖先生」(中編六, 廿三)

反對我的白話文學。不贊成！大概就是說

「新」的「新」，把複雜的語言削滅(削

滅)這好可就不壞(壞)——沒的採用代字和新字

麼？我按的臺灣話似孫休在「孫休書論必

雖然奉承而實為「暗地裡的理想」，但藝

公而再被駁過和移轉錢字得成癩的地方

(鮮明，不知道先生的意思怎樣？)

二、迎(嗟)——即

迎(靴)(希乙)(へエー)——即

「字讀」嗟，似乎倒不如另把迎字讀「

乙」(へエー)，也覺得莫如另一箇「迎字

尾就是嗟，「或」加走尾就是靴，希乙，

相混沌，使用的人容易下手，看的人可

「迎(希乙)」(迎(嗟)就

話的本色，能够鮮明容易照使才為臺灣話亦

然乎？願有說幾是條臺灣話亦

三、礎(作)給抑大家做

拗(野)字似乎和抑字兩者有些不同內在的地

臺灣話的文字

一 採集過去的歌謠，及現行的民歌

的方法來成立文字。

無限和像想

生體的混言文體的臺灣

X 光線室

不是贊成臺灣白話文學，總是沒有絕對

得很，而且太不苛難，訛音也很多！有

替(多人)是「狗」(或「狗」)或者移話就

可以「狗」(或「狗」)「狗」(或「狗」)

「狗」(或「狗」)「狗」(或「狗」)

經過過多人討論論者會覺得這完全的理

這個難題怎樣能帶給答覆的「罷了。先

子「阿母仔！你看阿爸的心肝有烏無？」

母「無！」

子「白賊，你講我吸(スウ)煙會烏心肝，阿爸

吸煙大，怎樣心肝會烏？」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母「……」

陳培豐一著

想像和界限

臺灣語言文體的混生

陳培豐＝著

2013年7月 出版

目錄

序章 漢文「混成語」化的想像和界限	1
一、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1
二、「同文」下的異民族支配	3
三、漢字的「混成語現象」	9
四、折射臺灣人精神與文化面貌的文體	15
五、以「漢文」為分析概念的局限	18
六、漢文的混成現象與歷史定位	21
七、本書構成	24
第1章 東亞漢文的「大熔爐」	27
一、前言	27
二、日本的漢文脈絡與「帝國漢文」	28
三、《臺教會》雜誌誕生	41
四、《臺教會》雜誌的影響	48
五、「殖民地漢文」的誕生與意義	64
六、小結	73

第2章 從明治體到「中國白話文」	75
一、前言	75
二、異於西方混成語結構的「殖民地漢文」	75
三、殊途同歸：殊事同指，異路同歸	89
四、從「中國白話文」出發的臺灣現代文學	99
五、文體想像與社會現實的落差	114
六、小結	125
第3章 「聽歌識字」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運動	127
一、前言	127
二、開啟文體問題的潘朵拉之盒	128
三、普羅階級教化主導權的爭奪	138
四、「聽歌識字」的語言運動	148
五、浮上檯面的階級、現代化矛盾	161
六、小結	169

第4章 「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界限	171
一、前言	171
二、「一篇多語」的分工式文體與效應	171
三、翻譯中凸顯的臺灣話文問題	184
四、難與現代翻譯接軌的臺灣話文	191
五、「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異同與論爭意義	203
六、小結	219
第5章 受縛的「殖民地漢文」	221
一、前言	221
二、「殖民地漢文」詮釋共同體的成熟化	222
三、臺灣人專屬文體的誕生	233
四、漢文與日文分際的移動	255
五、成為國策宣傳工具的中國白話文	272
六、小結	297

結論 戰前戰後的「殖民地漢文」與臺語文	299
一、前言	299
二、東亞地區的現代化與漢文的重組	299
三、從「殖民地漢文」看臺灣語文的發展軌跡	303
四、臺灣漢文的想像與界限	306
五、多語社會下臺語文的自助重生之道	311
六、同樣陷入「同文」泥淖的日本帝國	315
七、戰後的「殖民地漢文」與臺語流行歌曲	320
八、解嚴後的臺語文發展	327
九、低俗小眾到摩登大眾的現代版「殖民地漢文」	332
後記	339
參考書目	343
索引	359

序章

漢文「混成語」化的想像和界限

一、日本在臺灣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臺灣在甲午戰爭後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在帝國主義君臨世界的十九世紀，日本統治臺灣乃國際政治上弱肉強食法則下的結果，本毋須大書特書；但若從文化觀點視之，這在世界殖民統治史上卻有重大意義。

基本上，十九世紀之前的殖民統治，主要是西方白種人挾歐美文化優勢，至遠方支配有色人種。而日本統治臺灣的特殊性，在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皆為黃種人，且同處於東亞地區及漢字文化圈。日本是政治上的統治者，在文化上卻與被統治者共享諸多傳統文化資源，如思想上的儒教、文學上的漢字漢文與漢詩，以及音樂上的五聲音階、七五調等；因此，日本相較於被統治者並無明顯的文化優勢地位。其實殖民統治的本質在於「差異」，正因在人種、現代文明、傳統文化上存在顯著「差異」，殖民統治者方能以文明的傳道者自居，對異民族進行經濟榨取，並對其在政治上的壓抑與不平等的統治賦予正當性、神聖性。故欠缺「差異」的統治不易成立。

明治維新前，日本與當時仍為清朝領土的臺灣相仿，都以前述中國固有的學問與文明為長期仿效的對象。因此，在思索日本統治臺灣的諸問題時，無法只注重兩者的「差異」，雙方之間難以拂拭的「類似」，更是需要深入探討的面向。亦由於這些諸多「類似」的存在，使日本治臺時在政治上的強勢地位，無法同樣反映在文化層面。

日本對臺灣的殖民統治，除了文化不及政治強勢外，在地理背景上也有特殊面向。日本治臺，與「併合」第二殖民地朝鮮的情況不同。後者是對朝鮮領土進行全面支配，前者卻只是取得清朝領土的一部分進行統治。因此藉地利之便，臺灣即使成了日本的殖民地，與「祖國」中國的關係仍遠比與殖民地母國日本來得親密熟悉；加上在殖民統治下，日本政府對臺灣人與「祖國」間的來往雖有規範限制，但不至於完全禁止，於是臺灣與「祖國」間的人際、商業及文化交流，在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期間從未斷絕。¹ 由於地緣因素交流不斷，殖民時期的臺灣人與中國在文化上的「類似」仍得以持續。

自1920年代後半，日本帝國基於政治野心不斷強化對中國的政策，使東亞文化圈之間的「類似」，進一步透過日本治臺而浮上檯面。在所謂日華親善的政策下，文化近似中國的臺灣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擴張時與中國攀親帶故的重要媒介，而隨著邁入太平洋戰爭期，臺灣更是從帝國一隅的殖民地，躍升為地位舉足輕重的「南進基地」，成為日本欲稱霸大東亞時不可或缺的尖兵。尤其東南亞住著許多與臺灣人同樣出身大陸沿岸的中國僑民，他們在異地謀求安身立命，但在文化上仍保留了祖先的傳統與東亞漢字文化圈的生活模式。因此，

¹ 相關論述，可參見マーク・ピーティアー（Mark R. Peattie）著，淺野豊美譯，《殖民地：帝国50年の興亡》（東京：読売新聞社，1996）。

「漢字漢文」自然成了被賦予大東亞尖兵使命的臺灣人，在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時與東南亞華僑聯繫的語言工具。

欲精確探討日本在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首先必須跳脫「差異」（即歐美式的殖民地定義或既定印象），改由「類似」這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同處東亞文化圈的角度切入，兼以前述殖民地支配具有的特殊性為出發點來考察。具體而言，為了更精準論述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除了兼顧統治者「日本」與被統治者「臺灣」兩要素，更應放眼由中國所象徵的東亞文化圈，將其文化背景視為座標軸。其中尤以「同文」的存在最不可忽視，因為臺日雙方的共同文化遺產「漢字漢文」，對這座島嶼的統治帶來的影響十分深遠。

二、「同文」下的異民族支配

漢字漢文為古代中國人發明的文字文化。其後，就像歐洲的拉丁語傳播至整個歐洲，漢字漢文亦傳播至東亞各地，成為重要的文化資源。但漢字漢文為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的拉丁語在文字特性上並不相同。秦始皇（前 259 – 210 年）鑒於中國本土民族眾多、方言殊異，為了便於統治各地，乃命李斯以古文和各國文字為基礎創造小篆，成為正式統一的文字，此即「書同文」——無論何種語言皆以相同的文字文體書寫。而漢字漢文能達成統一書記這艱鉅任務的重要因素，在於表意的漢字漢文具有極端「言文分離」的特質。²

「言文一致」是人類的理想，也是現代化的象徵；但縱使在今

² 楊秀芳，《臺灣閩南語語法稿》（臺北：大安出版社，1991）。

日的現代化國家，「言文一致」的目標仍難以全面實現，漢字漢文也不例外。漢字漢文對人類來說有記述上的極限，故為求相互溝通，乃對「言文分離」進行逆向操作，將代表聲音的「言」這項要素分離、析出，而特別強調「文」的一致性來進行有效溝通。換言之，漢文正是以極端「言文不一致」的機能，為眾多相異的方言求得溝通「一致性」的文字表記方式。

極端而言，漢字漢文是著重視覺性的表記方式，以眼觀之的重要性大於以口讀之。漢字漢文將原本訴諸語音，無法互通音信的方言，透過可視化、文字化的過程，除去方言的語音要素，達到相互溝通的目的。秦始皇時統一的漢字漢文，隨即被賦予政治上的權威地位，使分散在中國各地、彼此隔絕歧異的眾多方言得以聯繫，並建構了絕對王權的統治基礎。此舉不僅讓巨大的帝國免於分崩離析，更開創出光輝燦爛的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的全盛期，約持續到象徵西洋文明昌盛的產業革命與文藝復興的十八世紀。對長期吸收中華文明的東亞地區而言，漢字漢文特有的表意性與可視性（visibility）具有相當便利的機能。因為不受限於發音，只要能理解漢字漢文的意義，就能創作出具有自我風格的漢文，也能共享誇耀世界的中華文明；同時，以自己的方式解讀漢字漢文的文獻與書籍，亦可視為一種翻譯的過程。³

日本長期翻譯中國儒教、佛教等經典，在文字上一面承襲漢字漢文的機能，一面形成獨特的自我語言文體。至江戶時期，日本的漢

³ 參考柳父章，《近代日本語の思想：翻訳文体成立事情》（東京：法政大学出版社，2004），頁29-40；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東京：岩波書店，2010）。

字漢文發展已臻鼎盛。為了吸收中華文明，如何將漢文翻譯成日語並與中華文明對話，正是明治維新前日本知識分子的最大課題。在中華文明的影響下，兩者間關係緊密，日本古典的文言文體，「漢文化」程度極高，幾乎就是將漢字漢文日本化的文體。不僅如此，長期以來，日本人在文字上以「類似」為前提維持「差異」，衍生出多樣的漢文解讀法，也創造出和式漢文，發明如峠、込、汨、辻、躰等日本獨有的漢字。對日本人而言，漢字漢文不僅是象徵身分與地位的權威財，也是生產知識的文化財，更是代表自身文化教養的消費財。⁴

江戶末期發生以否定漢字為運動旨趣的國語國字改革論爭，代表日本人對於學問的定義與知識價值的認知，在明治維新時已從中國轉向西洋。日本開始翻譯大量西洋書籍，中華文明則成為封建、陳腐的象徵；同時，漢字漢文作為權威財、知識生產財的色彩亦漸趨薄弱。對新生的日本而言，明治維新是擺脫漢字漢文的絕佳機會；但明治維新的結果反而製造大量和製漢語。為了吸收與翻譯西洋文明，日本不僅無法與漢字漢文徹底切割，還發展出包含許多漢字漢文的文體，如漢文直譯體或漢文訓讀體，進而成為現代日語的雛形。⁵

從東亞漢字漢文的歷史觀之，日本統治臺灣可謂「同文」使用者的相遇。對於以殖民統治為契機而相互接觸的雙方，漢字漢文扮演十分重要的媒介角色。甲午戰爭後，來臺擔任「國語」（指日語，以下同）教育者的伊澤修二，面臨的狀況與秦朝亟欲推行「書同文」政策時的中國本土幾乎毫無二致。

⁴ 加藤徹，《漢文の素養：誰が日本文化をつくったのか？》（東京：光文社，2006），頁211-234。

⁵ 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東京：岩波書店，2003）。

日本領有臺灣後，在島上強力推行國語教育。甲午戰爭後誇口「要讓全部臺灣人都能說國語」的伊澤修二，帶著兩百多位通譯隨行來臺，卻陷於無用武之地的困境。多語社會的臺灣宛如一個中國的縮圖，除了福建、廣東出身的閩南系、廣東系居民等擁有文字文化的漢民族外，島上尚有數個沒有自身文字文化的高砂族原住民。占人口少數的原住民同屬南島語系，卻各有各的語言，無法互通；⁶ 閩南系與廣東系的居民有漢字漢文的同「文」可勉強溝通，但同時也使用不同的「言」各自營生。在1895年這個時間點，臺灣島上混雜了十數種無法相互溝通的語言，思想溝通的唯一手段，恐怕只有漢字漢文。然而，在眾多語言使用者中，能運用清朝官話「北京話」者微乎其微；因此，與伊澤修二同行的北京話通譯，在臺灣島上毫無用武之地。⁷

語言不相通仍可透過筆談溝通思想，正是「書同文」的東亞漢字文化圈優勢。「沒有通譯仍可溝通事務，全乃仰仗漢字之便」，⁸ 因為漢字具有視覺上的優勢，伊澤修二得以藉由筆談與臺灣住民進行交流。對異民族的國語教育，初期採取混合主義的教育方針，即以日語／漢文對譯的方式教授，並以漢文為日本在臺灣推行國語教育的輔助手段。除了在國語教學現場的實用性，漢文之於異民族的統治也被賦予強烈的政治工具性。具體而言，漢文經常被當成「同文同種」的根據，以「文」的類似性來稀釋外來支配者的異質性，藉以合理化殖

⁶ 若林正文、劉進慶、松永正義編著，《臺灣百科》（東京：大修館書店，1990），頁27。

⁷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73。

⁸ 伊澤修二君選曆祝賀會編，《樂石自伝教界周遊前記》（東京：該會，1912），頁215。

民統治的作為；日治時期，伊澤修二就常提出此等政治主張。

伊澤修二來臺前，曾以批判漢字的立場，參與國語國字改革論爭；來臺後卻開始整合日、華、韓三個地區的漢字漢語，編纂《東亞同文辭典》。由伊澤修二態度的轉變，也可窺見漢字漢文在臺灣統治上的重要性。⁹

利用漢字漢文的便利性，在日本初次的海外統治中大展身手的人，不只伊澤修二。在國語教育關係上，與伊澤修二態度對立的後藤新平也是其中之一。1901年，當時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為了有效進行政治統治，對臺灣住民實施大規模文化、習俗的實態調查——舊慣調查，在探訪調查各個種族時，漢字漢文也能以「筆談方式」扮演重要的溝通媒介。日本領臺之初，能在極短時間內建構出文化人類學的知識體系，漢字漢文可說功不可沒。¹⁰

漢字漢文除了用來克服多種語言間的隔閡，或統制基準的知識性構築外，也經常用在民間交流或政治運作。甲午戰爭後，與傷亡累累的戰爭形成強烈對比的，正是在部分市鎮中，臺日知識分子和樂融融吟詩唱和的場景。漢詩以臺語吟詠或以日語訓讀吟詠，在語音上無法相互溝通，但只要看到漢詩的文字，便可理解詩文之意。無疑的，以漢字筆談或互相唱和漢詩，除了可以在政治方面稍加緩和殖民統治的氣氛外，還可降低臺灣人被敵人征服時的屈辱感。¹¹

⁹ 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頁89。

¹⁰ 柳書琴，〈生物學統治與流域生態：「南社」創社前地域文化資本之累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1（2009年6月），頁199-252。

¹¹ 楊永彬，〈日本領臺初期日臺官紳詩文唱和〉，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臺灣重層近代化論文集》（臺北：播種者文化，2000），頁105、

其實甲午戰爭後，日本漢詩漢文的全盛時期已經消逝。但因占有臺灣這個海外領土，日本一方面以確立國語教育為殖民統治的國策，另一方面卻在報紙與雜誌設立漢文欄，在民間成立漢詩社，使漢詩風潮捲土重來。格外諷刺的是，日本人最初於臺灣創設的御用報紙《臺灣日日新報》，其漢文欄的編輯者既非臺灣人也非日本人，而是清朝著名的文人章炳麟。可見，臺灣在軍事力量或現代化的成就上雖然落後，但其「祖國」的文化遺產——漢詩漢文，卻仍是日本不得不依附的對象。

標榜內地延長主義的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正是在高唱日語至上主義的同時，卻對漢字漢文表現出極端憧憬與眷戀的例子。田健治郎在大正初期大力提倡「同化」教育，強力要求臺灣人學習日語，但他每天寫日記用的文字並非日文而是漢文。¹²除了田健治郎這種長駐殖民地的日本人外，在日本本土懷才不遇的漢詩人森春濤、中村櫻溪，漢詩文巨擘內藤湖南、久保天隨，以及憧憬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佐藤春夫等，都曾為了體會「異國情調」而造訪臺灣。儘管漢字漢文在日本本土已失去昔日光彩，卻在這個日本最初的海外領土上東山再起。

在臺灣這個新天地，漢字漢文不僅是權威財、知識的生產財、教養的消費財，更成為一種統治的手段。將日本的臺灣統治視為植基

183；黃美娥，〈日治時代臺灣詩社林立的社會考察〉，收於氏著，《古典臺灣：文學史·詩社·作家論》（臺北：國立編譯館，2007），頁183-227。

¹² 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府田健治郎日記（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吳文星、廣瀨順皓、黃紹恆、鍾淑敏主編，《臺灣總督府田健治郎日記（下）》（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9）。

於與漢字漢文的深厚關係亦不為過，臺灣歷史上成立最多漢詩社團的時期並非清代，也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回歸「祖國」的時代，而是日本統治下的大正時期。¹³ 這個諷刺的事實，反映出在東亞漢字文化圈中殖民統治的特殊性。

三、漢字的「混成語現象」

隨著殖民統治的發生，統治者的外來語言與當地土著語言往往會出現主導權之爭。有關日語在臺灣對其他各種語言的打壓與造成的位階問題，許多先行研究已分別就帝國的殖民地統合、現代化、民族化等觀點，進行過探討與分析，於此不再贅述。¹⁴ 本論文在此試圖要提出的，是東亞漢字文化圈萌生的、獨特的「混成語現象」。¹⁵

¹³ 施懿琳，〈臺灣文社初探：以1919-1923的《臺灣文藝叢誌》為對象〉，發表於國立臺灣文學館、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主辦，「『櫟社』成立一百週年紀念慶祝活動學術研討會」，2001年12月8-9日，頁13-14。

¹⁴ 帝國殖民地國語政策之相關研究，可參見駒込武，《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岩波書店，1996）；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石剛，《殖民地支配と日本語：臺灣、満洲国、大陸占領地における言語政策》（東京：三元社，2003）等。

¹⁵ 以語言學的角度，使用Creole這個概念來說明日治時期臺灣漢文的混成現象，在定義上會有缺陷或縫隙，因此若排除Creole一詞而僅獨立使用「混成語」這個詞彙，在論述上會比較「安全」。但是為了凸顯勾連殖民統治此一歷史情境，本論文依然以Creole為背景概念。準此，相較於Creole的本義，本書Creole的使用方式類似「Creole料理」一詞中將Creole當成形容詞的用法，注重促進讀者對研究對象在性質上的理解，而高於學術上的定義。

甲午戰後，不同種族、語言、文化、習慣、歷史、社會經驗、政治立場的人們皆在殖民地臺灣營生，為了使政治統治與日常生活順利進行，不得不借重漢字漢文為溝通媒介。然而，由於現代化程度的差異，祖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各自擁有的漢字漢文，在特徵或承載的文章內容上各有局限；加上利用「同文」之便進行溝通者，處境及所欲溝通的內容、目的、議題或對象也不見得一致，語文的混雜交配現象乃迅速產生。

日本在1910年「合併」朝鮮，在同樣具有「同文」歷史文化背景的朝鮮實施殖民統治。不過朝鮮在日本支配前，已開始推展表音文字「諺文」，而且在殖民統治期間未被禁止。由於推行「諺文」，漢字漢文在許多刊物雜誌中出現的比例減少。換言之，同樣受到「同文」的殖民統治，朝鮮在這段期間卻有脫離漢字的語言自主過程；相對地，日治時期「同文」的文化條件則一直存在臺灣，兩者間漢字漢文混雜交配的條件背景不盡相同。

甲午戰後，在高度依賴「同文」的政治文化情境下，各式各樣的漢字漢文隨著統治者、被統治者與對岸祖國人士的使用，大量且迅速匯集於臺灣。這座島嶼頓時成了東亞漢文的大熔爐。

漢文原本就是由漢字羅列而成的文章。日治時期臺灣因殖民統治萌生語文混雜交配的契機，如何選擇各式大量的語彙及如何羅列組裝這些新漢字，對當時的臺日人士都是重要的課題。¹⁶從當時臺灣整體的語言文體狀況觀之，書寫文章時至少有日式漢字漢文、中國式漢字漢文（古典漢文），以及臺灣式漢字漢文等多樣的使用選項。

¹⁶ 野村雅昭，《漢字の未来》（東京：筑摩書房，1988），頁132-146；高島俊男，《漢字と日本人》（東京：文藝春秋，2001）。

臺灣割讓日本後意外踏上現代化之路，而舊的語言文體已無法因應急速的社會變化，勢必要走上求新求變之路。傳統漢文與臺灣式漢文，擅長表達儒教的世界價值或臺灣土著社會中的一切物象，在承載現代化思考與抽象描寫上，相對於日式漢文明顯有語彙不足或文體尚未確立的問題。在三種漢字漢文的機能與特徵各有所長之下，必然會出現混合三者而成的漢文。試看以下之例：

此乃社會一大變矣。我國從來所定士農工商之等級。及門閥舊習。進行壞破。四民為平等。加之以所誤解自由說為兵器。曰彼舊弊矣。曰此舊習矣。社會一切壞破去。¹⁷

此為 1905 年國語學校校長田中敬一的演講片段，由臺灣人學生林振聲翻譯，刊載於《臺灣教育會雜誌》。由此例可知，該文採用的文體是以傳統漢文、臺灣式漢文與日式漢文寫成的混合文體。「社會」、「平等」等語彙在今日的文章媒體中頻繁出現，理所當然被視為中文，但這些語彙對一世紀前的臺灣人實為不折不扣的新詞彙，是日本的和製漢語；以文脈中特殊的用法來看，「從來」、「加之以」為和製漢文；「社會一切壞破去」則為臺灣式漢文。此外，再舉 1930 年代臺灣白話文運動旗手郭秋生的文章為例：

這些數字上的事實到底物語什麼¹⁸

¹⁷ 國語學校校長田中敬一演說、國語部三年級生林振聲譯錄，〈吾之杞憂乎〉，《臺灣教育會雜誌》36（1905年3月），頁1-3。

¹⁸ 郭秋生，〈建設「臺灣話文」一提案〉，原刊《臺灣新民報》，1931年8月

（這些數字顯示的事實到底說明了什麼）

此例，基本上是傳統漢文與日式漢文的混成文。文中不僅借用「物語」這個原本不存在臺灣與中國的和製漢語，還將此名詞轉化成動詞。「名詞（物語）＋する」的文法不存在於臺語或中文，而是從日語文法來的混合文體。類似這樣的文體在1930年代臺灣的新聞雜誌中比比皆是，並非特例。

根據越川正三的文體定義，文體（style）是「依言語傳達事物者，為達成傳達的意圖選定語彙，並將選定的語彙依序有效排列的方法」。¹⁹ 依此定義，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社會，不僅存在「言」（聲音；也就是日語／臺語）這種殖民地統治中常見的語言層級問題，更含有「文」（即漢文文體層次）這種文體層級的問題，亦即漢文「混成語」現象的存在。

混成語（creole）是殖民地統治下衍生的附加物。所謂混成語，原指受歐洲殖民統治的加勒比海地區，一些母語文法構造相異的人們為了溝通對話，以當地方言的一支——皮欽語（pidgin 〈pijin〉 language）為中介語而新生成的語言。這裡要注意的是，混成語原指「言」（即口語），並未指涉書寫的文字，亦即還沒達到「文」的層級，因此常被貶抑成奴隸使用的混雜語言。²⁰ 然而前述臺灣的言語文

29日、9月7日，後收於中島利郎編，《1930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2003），頁36。

¹⁹ 越川正三，《文学と文体：ジャンルのなかの表現》（大阪：創元社，1976），頁3。

²⁰ 田中克彦，《クレオール語と日本語》（東京：岩波書店，2005），頁3-16。所謂Pidgin languages指不同種語言混合而成的混合語。特點是詞

體混成現象，是在「同文」的前提下，以表意文字為依據「近親繁殖」的結果，與歐美殖民統治下相異語言間的「異種交配」並不相同。不僅如此，這種新形態的漢文從統治初期，就經常被當作超越口語的共通記述用語來使用；不僅是臺灣人的媒體用語，同時也兼具文學書寫載體的功能。日本領臺後，臺灣發行的報章雜誌，如《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教育會雜誌》、《南音》等，刊載的漢文文章幾乎都以這種混成漢文書寫而成。

甲午戰爭後，臺灣成為漢字漢文的交會實驗之處。由於教育與辭典並未正式將這種新形態的漢文記述加以標準化與規範化，在此情況下，各不相同的新形態漢文爭相出現，陷於百家爭「書」的混亂。不過，令臺灣島上漢字漢文「混成語現象」更複雜的要素，還在於殖民地臺灣背景的特殊性，也就是對岸「祖國」的存在。

如上述，即使淪為殖民地，臺灣人與對岸中國的人際、經濟與文化交流並未中斷。中國當時正處於政治與文化均邁入激烈變動的年代，1920年代中國為了達成「言文一致」的目標，催生了中國白話文運動。在這波運動下，以往被批判為繁雜、封建的古典漢文（即文言文）逐漸邁向現代化。1920、1930年代，臺灣媒體轉載許多對岸中國的文章，部分臺灣人也投入了中國白話文運動，中國白話文因

彙量小，並從現有語言中借詞；沒有固定的語法、句法。其產生背景大多有大量移民遷入和殖民的情況，當地人和外來者在交際過程中，在語言上妥協而產生使雙方能勉強溝通的交際語言，一般只需十幾年就會發展成固定的完善語言；也有部分經由間接接觸或遠距離的經濟、文化交流而產生。若是民族、國家的邊界接觸，則會帶有各自民族語言的特點，如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同仁縣五屯鎮有兩千多人使用的漢藏混合語（五屯話）。

此成了臺灣人語言文體混成現象中的巨大變數。²¹ 具體而言，除了殖民統治者、被統治者本身的語言文體，構成臺灣漢文「混成語現象」的要素，應該也要加入所謂的祖國。

進入十九世紀，以日本為首的東亞各國逐漸走向現代化之路。日本的國語國字改革論爭或中國的白話文運動，皆可視為語言文體現代化的一環。從現代化語言與文體的關係加以考察，即使有些許時差，但日本統治期的臺灣，確實捲入了殖民地母國及對岸「祖國」雙方文體現代化改革的風潮中。臺灣人在嘗試組織新的漢文文體時，受到日本、中國等地域要素的影響，也遭遇到現代化風潮的強烈波及。

當然，日治時期臺灣人日常生活中主要使用的是閩南語，而非日語或中國白話文（北京話）。因此，隨著現代化風潮興起，身處文體混成現象中的臺灣人，不甘處於被動地位，開始出現建立自己語言文體的聲音，試圖朝言文一致的目標邁進。1920年代，臺灣出現的新漢文文體過分依賴中國白話文，與島上居民的生活用語產生隔閡，有鑑於此，臺灣知識分子開始倡議盡量排除中、日文體的要素，創造更適合臺灣人口語書寫的新文體，而1930年代的臺灣話文運動就是這種想法的具體實踐。臺灣話文運動與日本的國語國字改革論爭或中國的白話文運動相似，都是以達成文體的口語體化為目標。

臺灣話文運動是以臺灣多數居民的生活用語——閩南語為基準展開的文體構築運動，臺灣人據此創造出以聲音為中心的新文體，遂有口語體化及日治時期新的現代化語彙或文法的滲透，儘管這個新文體仍以漢字漢文為表記工具，卻逐漸脫離「同文」的大傘。臺灣話文

²¹ 有關這部分請參考翁聖峯，《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和其他種種漢文共有的是「文」而非「言」；臺灣話文的成立，勢必增強臺灣獨有的漢字漢文成分，無法避免文體由「類似」轉向「差異」。所以，臺灣話文運動可說是誕生與中、日關係疏遠的新文體運動。這個運動的出現，讓日本帝國統治下萌生的各種東亞漢字漢語問題，進一步聚焦於臺灣島上，從而浮現更加複雜的樣態。

四、折射臺灣人精神與文化面貌的文體

由於殖民統治，臺灣成了世界上極其少見的漢文「混成語現象」發生的舞臺。放眼世界殖民史，從未發生如此迅速、大規模的文體「混成語現象」。促成這個現象發生的是新舊時代交替的劇變；構成的地域要素則涵蓋日本、中國與臺灣三地；起因則主要萌生於東亞漢字文化圈下殖民統治的特異性。

其實，漢字漢文作為東亞各地域的共同文化遺產，在現代化過程中分支出日式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的現象，與歐洲各地區為追求口語文體，自拉丁語衍生義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等狀況相當近似。殖民統治型態或表記文字特性雖各有不同，但從歐洲各種語言的演化史來看，臺灣漢文的「混成語現象」，相當於拉丁語各自分化後，原本應不再交集、各自演化的語言，再度透過迅速集結、混成、再編的過程衍生新語言文體的狀況。

這裡要注意，由於缺乏辭典、教育、行政等推行文體標準化及規範化的手段，致使日治時期臺灣的混成漢語雖在報章雜誌上各自爭鳴，但書寫表記的方式紊亂，恣意性亦偏高。因此，各媒體的漢文文體仍存在微妙差異。基於不同種族、發行時期、旨趣、讀者的設定與

政治立場等因素，無論是官方報紙《臺灣日日新報》或臺灣人抵抗運動據點《臺灣民報》的漢文欄，乃至強調臺灣文化自主的《南音》與純漢文雜誌《風月報》，刊行在自家媒體上的漢文文體也會有所不同。這些媒體上的文體不僅在文／白（亦即文語體／口語體）上有所差別，構成要素（即所謂和製漢語、和式漢字、通俗漢文、臺灣漢文等）的比例與使用方法也各異其趣。此外，這些出現在不同媒體上的不同特色文體也各具特定的社會機能、政治立場；所處的歷史脈絡與設定的讀者層次也有明顯差異。縱使如此，這些形形色色的文體卻擁有互通識讀的管道。換言之，日治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臺日文人同樣是這些文體識讀共同體的成員；而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在於漢字的表意特性與日本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時，日本為因應現代化的需求而創造大量的「和製漢語」。這些語彙美其名是創新，實際上有極大的比例是移用或借用中國自古以來的語彙。²² 如「經濟」一詞源出中國的「經世濟民」，原指治理國家、拯救人民，福澤諭吉借用「經濟」一詞翻譯「economy」後，這個詞彙就被廣泛用於亞洲各區域。「經濟」的日語發音為「keizai」，中國白話文唸作「jinji」，臺語則為「kin-che」，發音各異，卻共用同一字形「經濟」，以同樣的視覺表象來表示「Economy」。

這種利用語言的「近親繁殖」吸納「外來」現代語彙的方式，

²² 和製漢語的研究，可參見森岡健二，《日本語と漢字》（東京：明治書院，2004）；高野繁男，《近代漢語の研究》（東京：明治書院，2004）；村山吉広，〈漢文脈の問題：西欧の衝撃のなかで〉，《国文学》25：10（1980年8月），頁40-45；石井莊司，《近代国語教育論史》（東京：教育出版センター，1983）。

讓東亞各地區在產製新語彙時，仍保留一定程度的「類似性」，使讀者可透過視覺閱讀理解文詞意義，進而相互識讀。換言之，在各媒體的混成漢文間有微妙差異、也有交叉重疊，內容與意義在某種程度上仍可互相溝通，難以劃出明確的界線。即使如此，在現代化思潮衝擊東亞各地之際，當時的知識分子為了達成自己的書寫目標，區分各自的文化屬性、趣旨，或強調個人的認同想像，仍會將各家媒體的文體冠上不同稱呼。根據筆者的整理，日本統治臺灣半世紀間，至少就有漢文、明治體、白話文、現代性漢文、日用文、平易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語臺灣文、在地漢文、流行文等，多達十幾種漢文文體名稱存在臺灣社會。

語言文體是思想溝通的手段，也是反映人類文化、歷史與思想的鏡子，人類在構築文化認同或建構群體想像時，語言文體一向是絕佳的材料。然而，殖民統治下的臺灣因眾多漢文文體間界線曖昧模糊，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面對這些文體時，自然會賦予這些文體不同的定義與相異的想像，進而延伸更複雜的政治或文化意涵。這些漢文文體有時是對「祖國」寄情的媒介，有時是強調臺灣人認同的道具，有時又反向成為對統治者政治妥協的手段，而在某些場合又被視為具有取得現代化自主性的功能。

由此觀之，各種型態的漢文並存於臺灣社會的現象，充分呈顯島上的社會文化變遷及住民們的土地經驗。甲午戰後，臺灣社會的發展步伐，可說是與這些文體的生成、變遷與消長共進退。因此，文體可謂探析日治時期臺灣政治、文化、思想、歷史與社會狀況時的絕佳材料。

五、以「漢文」為分析概念的局限

近年來臺灣各大學將臺灣文學視為正式學科，陸續成立相關系所，漢字漢文的研究也從迄今的鑑賞分析脫胎換骨，邁入殖民地時期臺灣現代化等相關議題的研究領域。即便如此，漢文、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等各式文體，在研究方法上仍常被視為平行存在的不同個體，沒有透過歷史勾連彼此的發展脈絡並賦予意義。²³

而有關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研究，方法與觀點也都停留在歷史現場的介面上，沿用戰前一些媒體的用語、慣稱，當成論述鋪陳的框架。這些研究具有開路先鋒的意義和貢獻，卻沒有把東亞「同文」的現實納入思考問題的座標，因此文體故事展開的舞臺多半局限於臺灣，至多只延展到中國，論述中的變因／變數無法帶進日本本身的文化結構，以及日本成為帝國後的領土膨脹野心對「同文」體系的投射效應。

更具體的說，由於考量概念定義或問題意識時，鮮少納入漢文的混成現象，即便處於「漢文大熔爐」的情境，也未能把握或善用這個歷史契機，進行立足臺灣、放眼大東亞的文體歷史研究。臺灣人的文體如何由傳統漢文的清代過渡到日治時期，在「異族同文」的文化政治情境下，臺灣、日本、中國、滿州、南洋等地的語文，在日治時期又如何在這座島嶼交錯、融合與滲透，進而開展成自己的語文，

²³ 近年來，漢詩文研究經黃美娥、施懿琳與廖振富等人的努力，在議題開發與研究手法上都有很大的突破與貢獻。不過，將研究縱深推展到整個東亞，並勾連各國的文化發展脈絡與各式文體間的運用變化，投射到臺灣人精神文化此一場域的研究，卻鮮少出現在兩者的研究成果中。

學界至今無人挑戰這個議題。²⁴

本書以日本殖民統治的特殊性為問題意識，以東亞漢字文化圈為整體視野，探討在臺灣登場的各式各樣漢文，彼此間的類似／差異、界限／想像如何被建構，並分析各式文體間如何相互影響滲透。為了探究這些課題，筆者反客為主，將向來被視為既定分析概念的「漢文」當成本書主要的分析對象。

綜觀日治時期的臺灣漢文研究，漢文（以漢字羅列而成的臺灣人文體）的稱呼，通常是與「日語」（表記上同時使用假名與漢字的異民族語言）相對照的概念。至今的歷史觀與相關研究，一直受這種二元對立的結構左右。例如，考察戰前臺灣漢文歷史時的分水嶺，多以1937年的皇民化運動或太平洋戰爭為準。目前的先行研究常不約而同指出，該年日本政府在軍部主導下，以妨礙日語普及為由，同時「廢止」《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等報紙的漢文欄；但這種漢文欄的「廢止」說法有待商榷。²⁵ 實際上，號稱於日治時期擁有最高發行數量的純漢文雜誌《風月報》，於1937年後仍在臺灣市面流通；各雜誌媒體版面上的漢詩也未就此消失。由此看來，吾人似乎應以「重組」的觀點，審視太平洋戰爭後漢文在臺灣被賦予的新定位或任務。原有的漢文欄「廢止」說，只是一味單純化、平板化臺灣漢字

²⁴ 蘇碩斌在〈日治時期臺灣文學的讀者想像：印刷資本主義作為空間想像機制的理論初探〉，《跨領域的臺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家文學館籌備處，2006），以及〈活字印刷與臺灣意識：日治時期臺灣民族主義想像的社會機制〉，《新聞學研究》109（2011年10月），頁1-41，皆曾觸及類似問題，但處理的地區主要是臺灣與中國；時間也限於1920年代。

²⁵ 河原功，《臺灣新文學運動の展開：日本文学との接点》（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218、219。

漢文問題的特異性或複雜性，事實上未必妥適。

■ 漢文欄遭「廢止」時，臺灣的漢文界曾如何應對？臺灣的漢文又如何展開重組的道路？漢文欄遭「廢止」的《臺灣日日新報》、《臺灣民報》，與繼續使用漢文的《風月報》系列雜誌，兩者的漢文文體有何異同？又有什麼關聯？再者，同一時期各種文體走向不同命運的理由與判準為何？考察這些問題的切入點，必須回歸文體本身。

■ 欲以漢文／日語二元對立的概念或觀點，深入探討臺灣歷史與漢文發展的進程，實有其限制。若從研究方法的觀點來看，筆者以為這種二元對立概念的歷史思考方式，以及忽視臺灣語言文體「混成語現象」的研究角度，皆有修正、調整的必要。而經過修正、調整後的文體研究方法和觀點，不僅是解明臺灣歷史的重要關鍵，也是分析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實態或機能的有效座標。

漢文是由漢字羅列而成的文章，是漢字文化圈的各區域、國家剛開始的文法表記方式。然而隨著時間變化，各國逐漸發展出各自獨特的漢文表記方式，也催生了漢文與本民族語言交互混雜的變體漢文。²⁶ 因此本書的漢文意指「古典漢文」、「正統漢文」或「純漢文」，亦即遵從傳統中國古語文法所作的文章；相對於此，「變體漢文」係指同以漢字排列卻使用不同文法的文體。具體而言，包含萬葉假名的漢文、僅使用漢字書寫的和式漢文，以及日本統治下臺灣各領風騷的十數種漢文等。

²⁶ 正如拉丁語系中的義大利語與法語般，由日本的假名、朝鮮的諺文、越南的字喃所書寫的文體，已不能再以「漢文」稱之。另外，十九世紀以日本為首，最早出現「正統漢文」成為「變體漢文」，並進而再分化、多樣化、分節化的現象，乃為語言文體的現代化，脫離正統漢文之「言文一致」的過程。峰岸明，《變體漢文》（東京：東京堂出版，1986），頁8-12。

本書所出現的「和式漢文」、「中國白話文」、「帝國漢文」、「漢文訓讀體」、「殖民地漢文」（詳見第1章）、「臺灣話文」、「混成漢文」等，皆屬於「變體漢文」，但考慮歷史脈絡及文體上的微妙差異，並為了讓讀者易於理解，有時將視論述脈絡與辨別的需要，以「殖民地漢文」這個自創概念統稱這些變體漢文，或以歷史現場上的不同名詞稱之。而這種概念設定或操作，在釐清或陳述這些界線不清又各有冠稱的文體時，應該就能有比較好的著力點來表達彼此的歷史定位或遠近關係。

六、漢文的混成現象與歷史定位

釐清日治時期臺灣漢文的混成現象與各文體間的歷史定位為何重要？語言是民族自我認同的有效象徵，不只可展現政治上的立場與態度，也常被視為抵抗的利器。²⁷ 截至目前，大多數研究咸認1920年代臺灣的「中國白話文」，是由留學中國的臺灣人帶回殖民地的文體，視為由外部移植臺灣的文化產物。基於中國白話文文體與臺灣歷史的關係，徵引上述所導出的結論常為：中國是被切割的「祖國」，留學中國的臺灣人學生帶回這種外來語言文體，並對此文體（中國白話文）積極接納的態度，是臺灣人懷抱中國民族主義的證據。²⁸

²⁷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臺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1995），頁175。

²⁸ 認為臺灣的中國白話文運動是由留學中國的臺灣人提倡，相關的研究如：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54-56；楊菁，〈張我軍在中國〉，《臺北文獻》145（2003年9月），頁

這種關於中國白話文的學界定論存有幾項疑點。首先，就當時臺灣知識分子互指對手的「中國白話文」書寫不純正、不精確來看，1920年代出現在臺灣的「中國白話文」，嚴格說來應該是由「中國式」、「臺灣式」及日本語彙等，交相混合而成的雜駁文體，也就是混成語現象的產物。²⁹ 因此，中國白話文這個冠稱，本身就夾雜太多不驗自明的政治邏輯或暗示，僅以中國白話文為分析概念進行較嚴密的檢證或延伸較精確的論述，往往有觀念上的局限和干擾。

在日本統治分隔下，臺灣與中國的住民往來雖不至於斷絕，但實際上留學中國且能正確使用中國白話文的臺灣知識分子並不多。³⁰ 在缺乏教育機關的支援與官方力量的推行普及，語言文體的標準化工具（如辭典等）也不充分的狀況下，中國白話文這種外來語言，能否如此輕易在臺灣島上生根發芽？³¹ 再者，標榜「我手寫我口」的中國白話文，是以北京話為主體的北方官話系統為基礎發展出的語體文，這種文體在臺灣是否有迅速滋生、大規模成長的土壤？綜觀1920年代以前臺灣的媒體生態與文體發展過程，不禁令人質疑「中國白話

154-155；翁聖峯，〈文學進化觀、文體大眾化與新舊文學論爭〉《日據時期臺灣新舊文學論爭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267-297。

²⁹ 李承機，〈殖民地臺灣媒體使用語言的重層構造：「民族主義」與「近代性」的分裂〉，收於若林正文、吳密察主編，《跨界的臺灣史研究：與東亞史的交錯》（臺北：播種者文化有限公司，2004），頁220。

³⁰ 例如林呈祿、蔡培火，以及《臺灣青年》另一位主筆黃呈聰，三人全為日本留學生，而非中國留學生。此外，如第2章所述，臺灣知識人雖有前往中國的例子，但時間點多為1930年代以後，亦即多在白話文運動發生後。

³¹ 關於辭典和語文的規範化與標準化，請參見安田敏朗，《辭書の政治学：ことばの規範とはなにか》（東京：平凡社，2006）。

文」既有的歷史定位。

在漢文欄被「廢止」前的1930年代，臺灣文化界曾圍繞臺灣話文運動的議題發生大規模論爭。論爭中，雙方陣營的支持者為了實踐自我的主張與貫徹自身信念，各自以支持的文體發表論文。贊成派以「臺灣話文」出擊，反對派以「中國白話文」應戰，但在費時四年、相互交鋒超過數百篇的論辯文章中，雙方卻毋須透過翻譯即可對話。³² 由該論爭所呈現的事實可知，當時臺灣人對使用不同語言文體的正當性爭論固然激烈，但兩者間的文體差異恐怕遠比想像的少。

語言文體間形成類似性非一蹴可幾，由此觀點推論，比起說出現在臺灣的「中國白話文」是突然自外地移植而來，更有可能是臺灣內部「自體生產」的文體。當然，這種狀況下的「臺灣」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要素強力左右；而「自體生產」則是指語言文體的混合與交融，即前述的「混成語現象」。

日本統治下，漢文有「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平易漢文」、「在地漢文」、「流行文」等慣稱，卻沒有足以反映「混成語現象」的概念名稱。此前，漢文、明治體、白話文、現代性漢文、日語文、平易漢文、中國白話文、臺灣話文、臺灣語臺灣文等名詞，都是以先驗的分析概念來代表多數漢文型態的語彙，而且都是曾出現在過去媒體上的慣用語。歷史現場的各種慣用語可以反映時代氛圍或部分人的主張與情緒，卻也暗示在缺乏客觀或較大的歷史觀點下，我們與這些慣稱和語言文體的實際內涵或生成背景其實存在隔閡；各色

³² 陳培豐，〈識字、書寫、閱讀與認同：重新審視193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收於邱貴芬、柳書琴主編，《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報：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7），頁83-110。

漢文也常認為本身「純正無垢」，和別的漢文「孤立平行」。

受到媒體慣用語與殖民統治的負面形象影響，現代日本在臺灣的形象大多在政治與教育的面向上探討；加上「漢字漢文」等於「漢民族」這個既有觀念的地域暗示性，使日本的殖民統治雖為臺灣的言語生態帶來巨大影響，在臺灣漢文的發展過程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在思考臺灣的「混成語現象」時，卻未深入思考以下三個狀況，而忽略或降低日本這個要素：

- ① 漢字漢文是日本傳統歷史的一部分。
- ② 日本在情感上對「同文」這個文化現象愛憎交織。
- ③ 日本這個東亞帝國在政治上對各種漢文都有生殺大權。

為了跳脫過去的研究方法，進一步釐清「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具體形象內涵、漢文欄「廢止說」的真相，以及《風月報》的實際樣貌，筆者認為研究時間的出發點，應追溯至甲午戰爭之前，不應只限於1920年代或1930年代的時代斷面；同時不應將稱呼各異的漢文視為孤立無關的個體，而必須把統治者日本的存在也放進座標軸，將漢文文體的「混成語現象」視為歷史現象加以考察。

七、本書構成

實際上，日治時期漢文文體間發生「混成語現象」，代表在殖民統治的臺灣，純正漢文的存在空間極受壓縮；加上殖民支配下的臺灣漢文未經政府統一的規範化與標準化，故戰前臺灣的「○○文」僅

能視為具高度流動性與恣意性的變則漢文。這些漢文與其說是客觀、有效標示語言文體分界的概念，不如視為當時臺灣人的思想、情感、目標與志向的投影，或是折射當時人們想像的鏡子。

將漢文的「混成語現象」視為歷史投影，進一步作為思考臺灣話文或臺語的演化指標，才能在歷史的軌跡中精確掌握這些文體的歸向、特徵與意義；將漢文進行歷史化、脈絡化與細緻化的分析也就有其必要。本書以「同文」文體的類似性為出發點；將前述文例中提及的漢文，亦即臺灣社會在日本統治下自然生成或混成的文體，統稱為「殖民地漢文」，當成貫穿整體論述的概念。

語言文體是人類形構文化與歷史不可或缺的工具，也是人類文化歷史的一部分。據此，欲重現現代臺灣人的精神文化史，必須以東亞現代漢文文體的變遷過程與漢文混成語現象的發生為座標，將甲午戰爭後出現在臺灣的各種文體，及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文化、社會、階級、思想與歷史意義，加以分析探討、考據檢證，方能得到較完整的觀察視野與理解。

本書由以下各層次的析論組成：(1)整理在東亞區域中被現代政治與傳統文化左右的漢字在臺灣引發的「混成語現象」；(2)分析這種混成的漢字漢文帶給臺灣人的想像；(3)探討這種文體想像的崩壞與重構，以及對這種想像的見解問題；(4)究明眾多文體的分界與生成過程；(5)探究在日本帝國擴張下，新的漢文解釋共同體重組的實際狀況。以上五個主題依序為本書前五章，第6章則為本書的考察與總結；以此篇幅試圖探討日治時期臺語文成立的歷史過程，為現代臺灣人的精神文化史進行點描。

本書最關心的課題，是以世界殖民史與東亞區域文化史的視角，考察出現在臺灣的漢字漢文諸相各具什麼意涵；這將在第5章及

結論探討。最後，本書是根據筆者近年發表的四篇單篇論文，在大幅度增刪潤飾後，加上重新撰寫的論文串結而成的研究專書。各單篇論文的出處謹記於下。

序章〈漢文「混成語」化的想像與界限〉為新作。第1章〈東亞漢文的「大熔爐」〉，乃由2008年8月2日於愛知大學所舉行之《帝國主義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日本愛知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學系共同舉辦）中提出的論文，進行重新翻譯與部分改寫、增補而成。

第2章〈從明治體到「中國白話文」〉，主要以2008年8月2日於愛知大學舉辦《帝國主義與文學》國際研討會（國立清華大學、愛知大學、哈佛大學東亞言語文明部共同舉辦）中提出之論文後半為基礎，進行翻譯、部分改寫與增補而成。

第3章〈「聽歌識字」的鄉土文學／臺灣話文運動〉，由2006年10月2日於臺灣舉辦「臺灣文學與跨文化流動：第五屆東亞學者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行政院文建會、國立清華大學）時提出的論文，進行改寫與增補而成。

第4章〈「中國白話文」與臺灣話文的界限〉，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和政治大學合辦之「臺灣文學的東亞思考」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翻譯、文體與近代文學的自主性——由敘事、對話的文體分裂現象來觀察鄉土文學〉，進行改寫與增補而成。

第5章〈受縛的「殖民地漢文」〉為文字量最多的一章，基本上為未發表的內容。結論〈「殖民地漢文」與臺語文的戰前戰後〉亦為重新撰寫之作。